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建構政治暴力與革命行動的簡約模型

Constructing a General Model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doi:10.30390/ISC.199808\_37(8).0001

問題與研究, 37(8), 1998

Issues & Studies, 37(8), 1998

作者/Author： 傅恆德(Hung-Der Fu)

頁數/Page： 1-1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8\\_37\(8\).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8_37(8).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建構政治暴力與革命行動的 簡約模型

傅 恆 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摘 要

集體政治暴力行動的理論有結構的、心理的和理性的三種主要的理論。從這些主要的理論中衍生出了四種理論：相對剝奪、資源動員、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差距理論。為了更周延地解釋集體行動，整合並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是迫切需要的。在本文中，除了整理文獻中對集體暴力行動的理論外，分別討論主要與衍生的理論，並嘗試從個案的研究來印證並建構模型，以期最後發展理論。研究發現結構性因素導致集體行動的產生，心理的因素是支撐行動的微觀基礎，而理性的資源動員是行動成功不可或缺的決定因素。雖然衍生的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的解釋，而簡約的模型有較完整的解釋。

關鍵詞：相對剝奪、資源動員、差距理論、階級理論、核心理論、衍生理論、簡約模型

\* \* \*

## 壹、簡 介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對政治行為研究的廣泛注意，政治參與如投票與選舉的研究成為行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這種偏重於傳統的（conventional）政治參與的研究隨著美國的六〇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學生的反越戰運動而改變，對非傳統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也格外注意。而亞非新興國家的政治參與和政治變遷也逐漸受到發展理論研究者的關心與注意。舉凡開發中國家所面對的罷工、抗議示威、暴亂、內戰、政變、



和革命等集體政治暴力與革命行動，<sup>①</sup>也隨著新興國家的產生、建立而使集體的政治行動成爲研究者注意的焦點。

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學者致力於大型理論的建構，集體政治抗爭行動的研究也不例外。其研究的重心是在結構理論、心理理論、階級理論和理性抉擇理論等四個理論。<sup>②</sup>結構理論著重在總體結構的特質和條件，認爲集體行動是結構性的產物；心理理論認爲行爲的挫折和不滿心理基礎是行動的關鍵；階級理論強調勞資階級與生產關係的衝突是暴亂的根源；理性抉擇是把行動看作是行爲個體對成本和收益精打細算的逐利行爲。

對集體政治抗爭行動的研究，也有從政治發展的各個層面與過程中著手。隨著總體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學者從政治變遷、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社會動員、民主與民主化、資源動員、分離意識、政府鎮壓等對集體政治行動的產生作跨國的比較。<sup>③</sup>由於總體的資料在詮釋集體行動的產生缺乏行動的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因此

註① 在本文中，討論的主題是政治暴力和革命行動。雖然在本質上是屬於社會衝突，但其與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在範圍上有些不同。Coser 指出社會衝突是「對價值的鬥爭或對地位、權力、和稀少的資源的主張。相衝突的團體不僅想獲得其所欲求的價值，並以中立化、損傷、或消滅對手爲目的」。Lewis A. Coser,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 232。社會衝突包括了一些層面較廣的現象如階級、種族、宗教、和社群衝突、暴亂、叛亂、革命、罷工、市民脫序行爲、遊行、示威、集會抗議等等。Anthony Oberschall, "Theories of Social Conflict," *The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 Vol. 4 (1978), p. 291。在本文中，依據 Douglas Hibbs, Jr. 的三個定義：一、行爲或事件的本身應是反系統的，是與現存的政治權威意見不和。二、它必須是直接並立即地政治性顯著，也就是說，最少它必須是擺出威脅的姿態，並對正常精英的運作有嚴重的不方便。三、這些事件必須引起集體或群體的行動。Douglas Hibbs, Jr., *Mass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Wiley, 1973), p. 7。在本文中，行動最大的區別在其政治性，因此，這些行動也稱之爲集體政治抗爭行動。

註② Barbara Salert,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ies: four theories* (New York: Elsevier, 1976)。她指出並比較四個主要理論的優缺點。

註③ 由於相關的研究爲數衆多，僅提出較有代表性的論著。政治變遷如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經濟成長如 Mancur Olson, "Rapid Growth as a Destabilizing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1963), pp. 529~552。社會變遷如 Ivo K. Feierabend, Rosalind L. Feierabend, and Betty A. Nesvold,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New York Time, e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Time, 1969), pp. 623~687。社會動員如 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5 (1961), pp. 493~514。民主與民主化如 Edward N. Muller and Eric Weed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4 (1990), pp. 624~651; Hung-Der Fu, *Modernization,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1。資源動員如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Addison and Wesley, 1969)。分離意識如 Lucian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Douglas Hibbs, Jr., *Mass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Wiley, 1973)；Walker Connor, "The Politics of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7 (1973), pp. 1~21; Hung-Der Fu, *op. cit.* 政府鎮壓如 Edward N. Muller, "Income Inequality, Regime Repressivenes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1985), pp. 47~61。



集體行動的研究也嘗試從個體資料如跨國問卷調查作研究。<sup>④</sup>這些研究連結了總體理論和個體的資料，提供總體資料所缺乏的個體動機，使集體社會抗爭行動的研究能更深入。

最近有關集體的社會抗爭行動的研究進入了新的紀元。Lichbach 指出了研究社會行動的三個重點：情況條件（conditions）、方法工具（means）、與規範價值（norms）。<sup>⑤</sup>McAdam、Tarrow 和 Tilly 界定並指出這三者的具體內容，他們認為，情況條件指的是政治制度與政治過程；方法工具是動員的結構如行動組織；規範價值是促使行動展開遂行的基本價值，如民族主義和宗教等意識形態。<sup>⑥</sup>他們並指出集體行動的理論已到了整合的階段。換句話說，研究社會集體行動已不再偏狹地限於結構、心理、階級、和理性抉擇四個理論，取而代之的應是一個更周延的整合理論。譬如，Gurr 和 Goldstone 舉出國家危機的根源、精英疏離的根源、大眾動員的根源、和影響革命抗爭的因素等四個主要的變數，來比較革命行為的產生原因與發展結果。<sup>⑦</sup>相較之下，比 Skocpol 對三個主要社會革命的研究（1979）來得更週延了。<sup>⑧</sup>

雖然 Lichbach, McAdam et al., 和 Gurr and Goldstone 三者的研究仍未脫離政治行為研究的三個主軸理論：結構、理性和心理，但是他們的研究已遠超過三個主要理論，並嘗試建構一個較為有說服力的整合理論。（請參閱表一）

雖然上述這三個研究，其著眼點、變數和使用的指標有些不同，但並未脫離制度的、理性的、和心理的主要理論範疇。如果我們能進一步整合這三個核心理論，找出其間的動力關係因果連結，便可以增強社會行動的理論。<sup>⑨</sup>為了進一步指認集體行動研究的三個主要研究主軸，我們可以從科際整合研究的傳統、主要分析的層次和研

註④ 參閱 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Political Action* (Beverly Hills: Sage, 1979); Edward N. Muller,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Edward N. Muller and Karl-Dieter Opp, "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1986), pp. 471~489; 傅恆德，「集體行動的整合理論」，東海學報，第三十七卷第五期（民國八十五年），頁一〇七~一三二。

註⑤ Mark Irving Lichbach,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I, May 5~6, 1996, p. 11.

註⑥ Don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A Comparative Synthesis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Toward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August 29~September 1, 1996, p. 2. 他們的論述乃針對所有的抗爭性社會運動以及革命運動。

註⑦ Ted Robert Gurr and Jack A. Goldstone, "Comparis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Jack A. Goldstone, Ted Robert Gurr, and Farrokh Moshiri, eds.,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Stud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pp. 326~330。

註⑧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kocpol 在稍後的研究中，也強調都市和跨階級和工作過勞的農民的聯盟的重要性。當然，如有專業的革命家和意識形態更可以加速並幫助革命行動的產生。Theda Skocpol, "What Makes Peasants Revolution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4 (1982), pp. 351~375.

註⑨ Don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op. cit.*, p. 18.



究的重點三方面來說明這三者間的關係。(請參閱表二)

表一 三個主要研究的比較

理論 \ 代表人	Lichbach (1996)	McAdam et al. (1996)	Gurr / Goldstone (1991)
結構的	情況條件	政治制度與過程	國家面臨的危機
理性的	方法工具	1.動員結構和行為組織 2.政治機會	影響革命性抗爭的因素
心理的	規範性價值	政治意識形態	1.精英的疏離 2.動員的意識形態

表二 主要理論的分析比較

	社會科學科際整合	分析的層級	研究的重點
結構(制度)	政治社會學	總體(宏觀) (制度的約制)	國家和世界體系
理性(組織)	政治經濟學	中介 (權力的角逐)	多元的自由主義
心理(文化)	政治心理學 文化人類學	個體(微觀)	規範價值 (行為的動機)

由於受到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影響，對政治行動的研究也從不同的層面與分析的層級來著眼，其研究的重點也不同。然而，多面向的集體行動研究也應該兼顧到不同的研究重點。從研究的內容來看，這三者與 Oberschall 的看法一致。他指出一個完整的社會衝突理論應包括下列三個主題：社會衝突的結構性根源，衝突團體的形成以及角逐團體的動員和行動和目標，衝突的發展經過。<sup>⑩</sup>這三個核心理論所著重的分析層級(levels of analysis)不同，其與 Tilly 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人民(population)、行動(actions)和信仰(beliefs)等三個層級有異曲同工之處。<sup>⑪</sup>

為了整理文獻對集體抗爭與革命運動的理論，並提出一個簡約的模型，在本研究中，首先(在第二部分)從三個核心理論來討論，其次(在第三部分)從三個核心理論所衍生出來的四個衍生理論，最後(在第四部分)提出一個最近發生的個案來著手模型的建構，最後(在第五部分)試圖建立一個有特色的集體抗爭行動的簡約模型。

註⑩ Anthony Oberschall, "Theories of Social Conflict," *The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 Vol. 4 (1978), pp. 291~315。

註⑪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Addison and Wesley, 1978)。簡言之，人民是結構的研究重點；行動是理性的研究重點；而信仰則是心理文化層面的研究重點。



## 貳、三個核心理論

研究集體政治暴力行動和革命行爲的理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有結構、理性抉擇的和心理文化三個，這三個理論對解釋集體行動的產生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制度結構、理性抉擇的和心理文化稱之爲核心理論，分別簡要敘述如下。

### 一、制度結構理論

把集體行動的產生當作是總體系統結構所衍生出來的結果。從系統均衡的維持，<sup>⑫</sup>到政治的抗爭機會的結構，<sup>⑬</sup>其基本的假設乃是認爲在某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或（和）政治系統、或（和）國際環境中，集體行動較容易產生。換句話說，社會的階級結構、產業分工的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國際環境的因素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集體行動的產生。從社會結構而言，社會的變遷、社會動員、社會的人口學特色均會影響到集體行動。社會的階級與經濟結構是否對立或日趨兩極化，是集體行動的關鍵。

社會變遷使得社會的主要價值體系在新舊之際、傳統與現代之間逐漸地喪失其穩定的力量。社會動員的過程直接地衝擊到原本就不穩定的發展中社會；社會人口學的特色如語言、種族和宗教的分歧惡化了國族（家）整合危機的困境。

從經濟的結構而言，由於產業的型態與分工、勞工階級的形成是造成結構上勞資對立的基本原因。而在都市裡的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在居住環境、生活方式與品質、教育與職業均有極大的差異。如同城市的居民和農村的居民間有些差距，這種二元化發展與對立造成社會極大的不安。結構性的偏差使得發展著重於城市，輕忽了農村；著重出口部門而輕忽了進口部門。

從政治的制度而言，國家（相對自主）的角色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素。其介入政治社群的強度、影響市民生活層面的深度、控制市民經濟活動的廣度，均影響了集體行動的形成、產生、活動、訴求、和具體的行動。譬如政府強制力的行使便是重要的因素。<sup>⑭</sup>

Johnson 所謂的系統不平衡便是一個代表作。他指出一個正在變化的社會系統，會造成許多壓力、危機和挑戰，而系統的功能惡化，加上不當的控制行動，便導致了革命的產生。簡言之，他從結構發生變化、系統失調來說明暴力和革命的產生。<sup>⑮</sup>

註⑫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註⑬ Sidney G.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olitical Protest and Democracy in Italy, 1965~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註⑭ 政府強制力的行使 (governmental acts of coercion)、政府的強制行爲 (governmental acts of coercion)、國家強制 (state coercion)、與政府強制 (government coercion)，都是指政府的強制、鎮壓與制裁 (negative sanctions)。

註⑮ Chalmers Johnson, *op. cit.*



## 二、理性抉擇理論

理性抉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從功利主義出發，用成本和收益來說明參與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假設每個行為者均嘗試極大化價值，來討論個人在社會中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在個人的層級，把集體行動看成是成本利益的計算，個人的參與是基於「人是理性行為者」的假設。因此個人的參與集體行動乃是為了極大化收益，同時極小化成本。在團體的層級，把集體行動看成是一種賽局 (game)。團體為了影響決策、角逐執政所採取的行動。這些競爭的團體角逐權力，他們傾向於使用策略在最佳的時刻形成或參與集體行動。

為了說明成本和利益，Olson指出選擇性誘因來說明行動的產生，除了經濟上(物質上)的誘因外，正面的誘因有個人地位、個人心理滿足和回報等，負面誘因有團體制裁等。<sup>①</sup>但是以理性抉擇理論來說明集體行動，搭便車 (free rider) 的問題仍需有力的論述來解決。<sup>②</sup>為了克服搭便車的問題，除了 Olson 提出選擇性誘因 (selective incentives) 外，Tullock 也提出娛樂 (entertainment) 效果，Silver 則將收入分成物質報酬 (material rewards) 和心理收益 (psychic income) 以說明集體行動的產生仍可以是理性的。<sup>③</sup>總之，不管是爭取個人的或集體的、物質的或心理的收益，理性抉擇理論是建立在成本和利益的考量。<sup>④</sup>從理性理論的觀點，理性的個人和理性的團體，會選擇在最適當的時機參與集體行動。

## 三、心理文化

把集體的行動看作是心理的動機和行為的結果，以「挫折—攻擊」(frustration-aggression) 來說明集體的行為。而因種族歧視、政府鎮壓所產生的挫折等導致攻擊行為的產生，文化的不同所產生的分離意識，尖銳的階級對立而產生強烈的階級意識等，均會導至集體暴力行為甚至於革命的發生。分別說明於下。

「挫折—攻擊」是指因挫折所導致的攻擊行為。這種行為較易發生於快速變遷的社會裡。人們從社會比較中，認為他們應該可以得到更多，但社會無法達成他們的期望，因此憤而進行攻擊行為。Gurr 指出挫折、憤怒產生暴力行為。<sup>⑤</sup>不可容忍的差距、

註① Mancur Olson,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0~61。

註② 搭便車的人不參加集體行動，無須付出成本，同時卻可享用非排他性的公共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理性行為者會選擇不勞而獲而不參加集體行動。因此在邏輯上，集體行動不易產生。然而集體行動仍時有所聞，理性抉擇理論勢必要作修正。

註③ Gordon Tullock,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Vol. 11 (1971), pp. 89~99; Morris Silver,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 *Public Choice*, Vol. 17 (1975), pp. 63~71。

註④ 收益應包括個人的和集體的、物質的和心理的收益。傅恆德，「集體行動的整合理論」，頁一一二~一一三。

註⑤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不滿、收入不均、和土地分配不均都會造成集體暴力行動的產生。

分離意識 (separatism) 是指由於在社區、種族、語言、階級、宗教等社會人口學的特色有明顯而尖銳的區分，而使團體對國家的建構有不同的意見。<sup>①</sup>最近的加拿大魁北克，英國的北愛爾蘭和蘇格蘭，南斯拉夫的解體等均屬於這一個範疇。分離意識多半是基於不同種族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以及多數的鎮壓而產生。<sup>②</sup>在本質上，這是一種文化的衝突和心理的衝突。<sup>③</sup>

階級意識 (class conscious) 自馬克思以來均被視為社會衝突的主要因素。由於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而產生了同仇敵愾的階級意識，是造成以階級為主的社會暴力與革命的心理因素。

此外，宗教信仰的磨擦和 (或) 種族的嫌隙，均是引起衝突的來源。在宗教衝突方面，中東地區有基督教與回教；在印度半島有回教和印度教。在種族衝突方面，在安哥拉等非洲國家的種族衝突引起的種族滅絕 (genocide)；在前南斯拉夫，波士尼亞的種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 都是屬於心理因素的集體行動。<sup>④</sup>根據 Gurr 和 Harff 的在一九九三年間統計，全世界有五十七個國家有程度不同的種族宗教團體的衝突，因而死亡的人數在蘇丹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萬人，在安哥拉約有五十萬人，在索馬利亞有三十五萬人，在伊拉克、印尼、和波士尼亞均高達二十萬人，在利比亞、斯里蘭卡、查得、中國也有十萬人以上因衝突而喪生。<sup>⑤</sup>除了在國家內部的衝突外，在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戰便是來自不同文明間的衝突。<sup>⑥</sup>

### 叁、四個衍生的理論

在三個主要理論的架構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追求較大型理論的努力。然而，為了追求較強的解釋力，集體行動的研究者便從事整合理論的建構。<sup>⑦</sup>為了方便說明並

註① Charles L. Taylor and David A. Jodice,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Vol. 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5. 他們指出阿爾及利亞等四十四個國家有分離主義者團體, *Ibid.*, pp. 55~57.

註② 分離意識的測量是依照人口中有多少人想要脫離目前的統治。

註③ 雖然分離意識的動機可被視為理性的因素，但分離意識在本質上仍舊是文化心理的產物。Gurr 指出分離意識是相對剝奪的長期指標。Ted Robert Gurr,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No. 2 (1968), p. 1104.

註④ 但是 Goldstone 指出悲慘和痛苦會產生暴亂仍有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Jack A. Goldstone, *Th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evolution*, 2nd e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4), pp. 1~2.

註⑤ Ted R. Gurr and Barbara Harff,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1994), pp. 160~166。

註⑥ Samuel P. Huntington 原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台北：聯經，民國八十六年)，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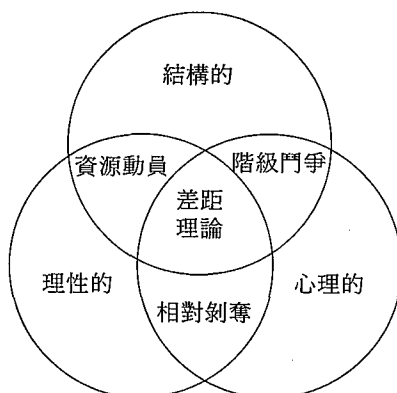
註⑦ 傅恆德，「集體行動的整合理論」，頁一〇七~一三二。





整理這些理論，以下圖來表示四個衍生的理論，<sup>㉔</sup>並分別說明。（請參看圖一）

圖一：三個主要理論和四個衍生理論



### 一、資源動員理論：結構的和理性的

資源動員 (resource mobilization) 的最基本假設是，在特定的情境下，結構發生了變動，角逐的團體運用所有可能的資源，在最佳的時候來角逐執政。因此資源動員包括了兩個主要的面向：結構性的和理性因素。當一個社會發生政治暴力行動或革命時，其首要問題便是什麼團體角逐政權？他們有何訴求？角逐的團體有什麼能力動員資源，以便繼續加強他們的訴求？另一方面，握有強制力的權威當局有什麼力量，可以擊敗角逐的團體。<sup>㉔</sup> Tilly 指出當角逐者（或角逐者聯盟）提出訴求要取代現行的政體時，握有強制力的政體不願或無法鎮壓角逐者的訴求時，革命便產生了。<sup>㉕</sup> 從對伊朗革的研究中，Jerrold Green 充份的印證了這個看法。他指出現代化使政治參與的需求提高，在國家能力逐漸減弱時，導致政治動員，使人民簡單化政治取向，進而形成兩個主要團體：支持與反對國家（政府）的團體。<sup>㉖</sup> 角逐執政的雙方，如何動員金錢、人員、武器、資訊、及領袖等資源，在最佳的時機向對方作強力的挑戰。<sup>㉗</sup> 而握有權力的政府，會用行政的力量發動（強有力的）鎮壓。其鎮壓的意願和能力便成為政權是否得以繼續的指標。<sup>㉘</sup>

註<sup>㉔</sup> 這些衍生的理論在本質上是由三個主要理論間的結合或引申發展出來的。

註<sup>㉕</sup>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p. 54~55.

註<sup>㉖</sup>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p. 200~202.

註<sup>㉗</sup> Jerrold Green, *Revolution in Iran: The Politics of Countermobiliz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2), p. xiii.

註<sup>㉘</sup> Chalmers Johnson, *op. cit.*

註<sup>㉙</sup> 有關政府使用強制力 (negative sanction) 的研究指出，由於鎮壓的強度與鎮壓的方式不同，有時鎮壓能遏止暴力，有時卻會昇高衝突的層次，Hung-Der Fu, *Modernization,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p. 96.

## 二、相對剝奪理論：理性的和文化心理的

Ted Gurr 主張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 是人們參加政治暴力和革命的主要心理狀態，是成員對社會感受到價值期望與價值現實的差距。<sup>④</sup>這種相對剝奪的來源是期望和現實的差距。Davies 指出當差距到了不能忍受時，革命便產生了。<sup>⑤</sup>心理挫折是造成行動的主因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這種「挫折—攻擊」的連結充分地說明了行為的動機。<sup>⑥</sup>土地分配不均、收入不均、和不满等也是基於相同的邏輯理。<sup>⑦</sup>由於這些挫折與不满都來自社會比較，因此在本質上，相對剝奪是理性的比較和心理的感受。

## 三、階級理論：結構的和文化心理的

Skocpol 指出階級結構 (class theory) 和階級的角色是集體行動的主要結構性基礎。階級鬥爭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結構，生產關係和生產工具造成了新的社會關係。由於資產階級的產生，階級壓迫與剝削會造成階級意識與社會疏離，進而造成以階級為主的暴力和革命的產生。總之，Marxists 從生產工具與生產關係來說明集體革命的產生，從經濟結構的因素來說明集體行動的起源。譬如 Moore 從結構中區分不同類型的來討論中產階級 (bourgeois) 革命如英國、美國和法國；法西斯 (fascist) 革命如日本和德國；以及共產 (communist) 革命如蘇聯和中共。<sup>⑧</sup>Skocpol 整合了 Marx 和 Moore 的看法，加上國際環境和國家角色，從世界體系的架構中指出由下而上的社會革命的產生。<sup>⑨</sup>

總之，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除了整合結構和心理理論，有相當的解釋力。基於不同的著眼點來說明集體行動的產生。結構的因素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決定因素，心理文化便助長了暴力和革命行動的產生。而共產黨的組織與資源的動員加速了革命的成功。換句話說，生產關係的失衡與勞資對立是結構性的，階級意識的產生是心理的。

註④ Ted Robert Gurr,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1968), pp. 1104~1124。

註⑤ James Channing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1962), pp. 5~19。

註⑥ I. Feierabend et al.,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H. D. Graham and T. Gurr, eds.,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9), pp. 632~687。

註⑦ 土地分配不均：Manus Mildlarsky, "Rulers and the Ruled: Patterned Inequality and the Onset of Mass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3 (1989), pp. 587~595；收入不均：Edward N. Muller, "Income Inequality, Regime Repressivenes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0 (1985), pp. 47~61；不满：Edward N. Muller and Thomas O. Jukam, "Discontent and Aggressive Political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1982), pp. 159~179。

註⑧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註⑨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四、差距假設：結構的、理性的和心理文化的

雖然階級理論已隱約地跨越了三個主要的理論，<sup>⑩</sup>然而最有代表性的整合努力應是 Huntington 所提出的差距假設 (gap hypotheses)。<sup>⑪</sup>他指出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差距是造成暴亂的主要因素。同時他也強調貧窮產生暴亂的看法是不正確的。窮國之所以會有較多的政治暴力，不是因為他們窮，而是因為他們想要富。因此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的動員，大量的農村人口擁向都市，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水準往往無法滿足許多人的需求，社會挫折便產生了。在沒有動員機會的發展中社會，這些挫折便轉變成大量的（非法的）政治參與。在缺乏政治制度化的社會，大量的政治參與便造成了政治不安定。<sup>⑫</sup> Huntington 以三個簡單的方程式來說明這一個機制：<sup>⑬</sup>

$$\begin{array}{ll} \frac{\text{社會動員}}{\text{經濟發展}} = \text{社會挫折(1)} & \frac{(\text{結構的})}{(\text{結構的})} = (\text{文化心理的}) \\ \frac{\text{社會挫折}}{\text{動員機會}} = \text{政治參與(2)} & \frac{(\text{文化心理的})}{(\text{理性的})} = (\text{理性的}) \\ \frac{\text{政治參與}}{\text{政治制度化}} = \text{政治不安定(3)} & \frac{(\text{理性的})}{(\text{結構的})} = (\text{集體抗爭行爲}) \end{array}$$

這三個機制環節緊扣，說明了其間的因果連結。結構的因素是長期現代化所產生的改變，而引起的連續反應。換句話說，在穩定不變的社會是無法產生集體暴力行動。因此結構的因素是充分但非必要的條件。當社會結構改變，社會動員的結果是社會挫折（文化心理的因素）。而文化心理的因素在一個缺乏動員機會的情境中，（以團體為主的）政治參與便產生了。參與的擴大，在政治制度化不足的開發中國家，集體暴力行為成為自然的結果。

#### 肆、從個案的研究與檢討

為了檢測上述的主要理論與衍生的理論，並建構一個簡約的模型，從厄瓜多爾 (Ecuador) 在一九九七年二月間的政治暴力事件加以檢討分析，希望能從整個事件的檢討而有所收穫。這一個南美洲國家在一星期中有三人自稱是總統，在二月間的政治行動中，有兩百萬人（約全人口的五分之一）走上街頭，在一星期內，造成了至少二死二十三傷的集體暴力事件。最後，前總統被罷黜流亡海外，前副總統繼任後辭職，前國防部長也辭職，前議長繼任為總統。

註⑩ 如果按列寧的想法，一個有組織的共產黨與活動會助長革命的成功，那麼加上了資源動員的成分，便加上了理性的特性了。

註⑪ 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Barbara Salert, *op. cit.*

註⑫ Hung-Der Fu, *Modernization,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hap. 2. 在第二章中有詳細的討論與實證檢驗。

註⑬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5. 在右側括弧中的文字是作者加上以作為參考。



一、事件發生的經過<sup>④</sup>

茲將該事件前後經過表列如下：

發生日期	事件概述	備註 <sup>⑤</sup>
Feb.5,1997	工會的領袖 Luis Villacis 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罷工。以抗議政府在電費、汽油和電話服務費的調漲，其漲幅將近元月初的三倍。厄瓜多爾工會支持者，在首都基多（Quito）發動了一個為期兩天的罷工示威，以抗議政府嚴苛的政策，並要求六個月前才上任的民選總統 Abdala Bucaram 辭職。	社會挫折 相對剝奪
	警察和示威的群眾發生衝突，至少有十名示威者和八名警察受傷。山區各省幾近癱瘓，因示威者與警察發生了衝突，警察發射催淚瓦斯試圖驅散群眾。為數千名原住民抗議者以石塊和樹木阻斷主要道路。銀行和金融機構以及工廠也都關閉。政府宣布國家進入動員時期，並允許軍隊來維持秩序。	資源動員
	國會議長 Fabian Alarcon 告訴新聞記者，他曾多次受到威脅不得討論有關罷黜總統的議題，否則國會將會遭到解散。	資源動員
Feb.7,1997	國會召開臨時會議，以 44 比 34 議決以「心智不能勝任」（mental incompetence）為由罷黜總統 Abdala Bucaram。 <sup>⑥</sup> 隨後議長 Fabian Alarcon 在國會宣誓就任，取代原總統職位，任期至一年內擇期選出新總統為止。	制度化不足
	副總統 Rosalia Arteaga 發表文書指出她有權繼任為總統。 <sup>⑦</sup> 總統 Bucaram 拒絕離開官邸，指 Alarcon 是議會的獨裁者，以野蠻的司法裁決進行奪權。	制度化不足
	數千名示威者包圍總統官邸附近，要求 Bucaram 立刻離開官邸。軍隊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並對空鳴槍以驅散示威群眾。	鎮壓 資源動員
	厄瓜多爾陸軍總司令 Paco Moncayo 將軍與數位資深將領前往總統官邸與 Bucaram 秘密會談，會後發表宣言，指出政治不安已使軍隊有強烈的不安和不確定感，希望能快速解決政治危機，避免權力真空。	制度化不足
Feb.8,1997	軍隊「口徑一致」地支持以民主方式和和平解決危機，並繼續保持中立。陸軍總司令建議三位展開對話，Bucaram 和 Arteaga 同意，但是 Alarcon 拒絕。	

（續後頁）

註<sup>④</sup> 資料來源為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中引用的路透社（Reuters）和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記者的報導。

註<sup>⑤</sup> 備註中的文字是本文作者的判定，作為論述的參考。

註<sup>⑥</sup> 根據厄國憲法，只要國會過半數通過（簡單多數）便可以用「心智能力不足」（mental incapacity）將總統解職，以避免冗長的彈劾過程和彈劾所需的三分之二的特別多數。因此在八十二位成員的國會中，四十二名便為足夠。因此，44 比 34 的投票結果是可以要求總統去職。

註<sup>⑦</sup> 厄國憲法對上述的情形並沒有明文規定。

(接前頁)

發生日期	事件概述	備註
	衝突繼續在各地發生，數百名的軍人在總統府廣場維持安全，以層層的鐵絲網保護。Alarcon 曾帶領一個遊行隊伍到總統府廣場，但被警察以水喉將示威者驅離到三條街以外。有一名高中學生被催淚瓦斯瓶擊中而喪生。	資源動員
	厄瓜多爾各地約有兩百萬人在城鎮遊行要求 Bucaram 下台。在厄國最大的城市，Guayaquil，支持 Bucaram 的群眾與反政府的示威者發生衝突，一名年輕婦女被射殺。其他至少有五名示威者和警察受傷。	資源動員 反動員 政治參與
	國防部長 Victor Hugo Bayas 指出總統 Bucaram 已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資源動員
Feb.9,1997	爲了平息政爭，軍隊與國會取得協議，先讓副總統 Arteaga 繼任總統職，俟幾天後 Arteaga 辭職，Alarcon 便可以繼任總統職位，任期至一九九八年八月的選舉。	制度化不足
	軍隊決定不支持 Bucaram 及其所宣布的緊急狀態。國防部長 Bayas 宣布辭職，因爲他在早先支持 Bucaram 的緊急處分。遺缺由原陸軍總司令 Moncayo 擔任。	制度化不足
Feb.10,1997	國會無異議通過，由副總統 Arteaga 繼任總統。Arteaga 成爲厄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總統。	
Feb.11,1997	Arteaga 認爲她應繼任爲總統直到國會修改憲法，決定誰應該成爲繼任的總統。Arteaga 堅持在憲法修改前，她不會下台。引起了另一波的混亂。	制度化不足
Feb.12,1997	在軍人的介入後，Arteaga 改變主意，宣布辭職。	資源動員
	在軍隊的支持下，Alarcon 在國會中以 57 比 2 的比數被議員選爲新任的總統。他必須在一年內決定改選時間，其任期到一九九八年八月。在接受任命的演說中，Alarcon 指責 Bucaram 的腐敗、任用親戚、行爲乖張的困窘行爲。 <sup>④</sup>	制度化不足
	新任國防部長指出軍隊是民主的、守法的，從未想過要發動政變。	制度化不足
Feb.13,1997	厄國的一國三總統的政治危機暫告結束。 <sup>④</sup> Alarcon 面對了巨大的預算赤字、近 50% 的通貨膨脹和（由於前此政府嚴苛的政策所引起的）敵視政府的社會大眾。	社會挫折

## 二、社會經濟人文地理背景

厄瓜多爾 (Ecuador) 位在南美洲西北部，首都爲基多 (Quito)，人口約一千一百萬人。其中西班牙人有 10%，印地安人有 25%，西印混種有 55%，黑人有 10%。

註<sup>④</sup> 批評者指 Bucaram 喜歡喝酒、女人、和唱歌。最近還灌製 "Jail House Rock" 使厄國蒙羞。Bucaram 的綽號是 "El Loco" 或 "the crazy one"。

註<sup>④</sup> 在一週內同時有三人宣稱自己是總統：Abdala Bucaram, 44 歲；Rosalia Arteaga, 40 歲；Fabian Alarcon, 50 歲。



人口中有 95 % 信奉天主教。人口成長率為 1.96 %；預期壽命為 71 歲（男 68.5 歲，女 73.8 歲）；成年人識字率為 84 %。從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0~14 歲占 35 %，15~64 歲占 60 %，65 歲以上占 5 %。<sup>⑤</sup>根據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一九九五年的資料顯示，厄瓜多爾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為 1280 美元。<sup>⑥</sup>真正國內平均生產毛額成長率（real GDP growth rate）為 2.3 %；通貨膨脹率（consumer prices）為 25 %；<sup>⑦</sup>失業率為 7.1 %。<sup>⑧</sup>在 *Freedom in the World, 1995~1996* 一書中，厄國被歸類於自由國家。但由於其民主制度退化和腐敗，民主化程度在下降中。<sup>⑨</sup>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厄國是一個典型的中收入開發中國家。但若以較為長期的觀察，厄瓜多爾的平均國內總生產毛額成長率（GNP per capita growth rate）在一九六〇~七九年平均 4.3 %，一九八〇~九二年平均為 -0.3 %。<sup>⑩</sup>通貨膨脹率在一九七〇~八〇年平均 13.8 %，在一九八〇~九二年平均 39.5 %，而有逐漸惡化的趨勢。<sup>⑪</sup>成長逐漸下降，通貨膨脹率卻逐步攀升。在一九八〇年的外債為 5,997 百萬美元；占該年 GNP 的 53.8 %；到了一九九四年，外債達 14,955 百萬美元，占該年 GNP 的 96.6 %。<sup>⑫</sup>從上述三個指標可以約略知悉厄國在經濟發展的困境。經濟成長率由正成長轉成負成長，通貨膨脹率比十年前多了三倍，其對社會的衝擊是相當大的。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厄國的政黨是極為分化的，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曾得到國會席位的政黨有二十個。軍人在政治上的角色也極為特殊，根據 Mariruzzaman 指出，自二次戰後，厄瓜多爾的軍人進出政壇共有四次。分別為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在一九六一年有短暫數日；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和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九年。在一九七九年才退出政壇，回到了文人的統治。<sup>⑬</sup>

### 三、以各理論檢討個案

以厄瓜多爾的例子，從各理論加以檢討，我們可以清楚地指出集體暴力行動的結構性、理性、和心理的基礎。首先從三個核心理論來說明。就結構而言，自一九七八

註⑤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nsolo/factbook/ec.htm>.

註⑥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2~163。書中指的是依 1993 dollars 可能是低估了。在 James Finn, ed, *Freedom in the World 1994~1995*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pp. 225, 其依物價指數調整後的購買力 (PPP) 為 \$4140。

註⑦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2.

註⑧ 厄瓜多爾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真正平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real GDP growth rate)、通貨膨脹率 (consumer prices) 和失業率均為一九九五年估計值。

註⑨ James Finn, ed., *Freedom in the World, 1994~1995*, p. 225.

註⑩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6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5

註⑪ 在 1984~1994 年通貨膨脹率為 47.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0.

註⑫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p. 220。

註⑬ T. Mariruzzaman,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Politic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7), p. 227.



年的憲法以後，總統由人民直選，任期四年；國會分別由地區和全國不分區選出，任期分別為兩年和四年；地方政府也由人民選舉產生，軍人退出政壇。就選舉的機制而言，厄國具備了民主國家的要件。然而二十年來政治的腐敗、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落和經濟的衰退，在結構上，已經有一個相當不利的因素。就理性抉擇理論而言，角逐執政的團體，在人民普遍對政府不滿時，進行有組織有計畫的行動來挑戰政權。換句話說，當政經等結構條件因素均不利於執政者時，角逐執政者發現「民氣可用」，因此發動群眾進行罷工示威，進而爭取輿論和軍方的支持，採取最佳的策略和行動，期能罷黜總統。就心理因素而言，長期以來經濟的負成長造成人民對政府的能力有不信任感；政治人物的相互傾軋造成人民的疏離感。在經濟方面，外債比例日益升高，通貨膨脹也居高不下，就一般人民而言，收入已相對減少，生活日益拮据。在此時調高物價，人民的挫折與埋怨自然升高，終究導致暴力行動。

其次從衍生的理論來檢討，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同理論的解釋力。首先從資源動員理論來說明。當總統 Bucaram 的聲望下降到 11 % 時，<sup>⑩</sup>反政府的團體發動人民的支持，影響輿論，作成決議，遂行集體抗爭。首先，工會領袖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罷工示威，以抗議政府嚴苛的政策。接著議長告訴記者，他被威脅不得討論有關罷黜總統的事情以博取輿論的同情。因而在國會以 44 比 34 決議以「心智不能勝任」為由罷黜了總統 Bucaram，並推舉議長 Alarcon 為新任總統。當 Bucaram 拒絕下台時，議長帶領了一個遊行隊伍到總統府廣場示威。最後造成將近兩百萬人在各個城市進行抗議示威。使得原本「中立」的軍隊轉而不支持總統所宣布的緊急時期，最後導致總統下台、副總統扶正後辭職、國防部長解職，而議長則順利地接任總統，陸軍總司令接任國防部長。

另一方面，支持政府的團體擁護政府的行動從警察鎮壓、軍隊介入鎮壓、發動支持政府的遊行。當群眾在各地發動罷工示威時，警察以催淚瓦斯對示威的群眾加以鎮壓。接著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時期，並允許軍隊維持安全。國防部長支持總統並進行鎮壓示威群眾。支持政府的民眾與反對政府的群眾發生衝突。

由於軍隊決定不再支持總統 Bucaram，反對勢力在多數人民、輿論、議會和陸軍總司令的支持下，罷黜了總統 Bucaram，促使國防部長 Bayas 去職，副總統 Arteaga 下台，是反政府的勝利。而議長 Alarcon 最後被選為新任總統，陸軍總司令進而擔任國防部長，是個人的勝利。而 Bucaram 只得到前國防部長和少數群眾的支持，終於喪失了政權。

其次，從相對剝奪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一個事件。由於六個月前才上任的總統 Bucaram 並未能解決經濟的問題，而引起廣泛的不滿。當油電價上漲三倍時，人民因通貨膨脹而引發不滿，使得有組織的罷工因此而產生。長期的經濟負成長，使得國內實質所得

註⑩ 根據路透社引述一家私人調查的結果，Bucaram 的認可率只有 11%。“Strikers and Police Injured in Clashes,” *The China Post*, Feb. 7, 1997, p. 2.



相對減少；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使原本就較少的所得又向下調降。這種「左右交迫」使人民的相對剝奪感加深。相對於厄國前期（1960~80）的經濟成長和緩和的通貨膨脹率，可謂天壤之別。

接著從階級理論來討論這事件。雖然並沒有明顯直接的證據看出這一個事件有階級意識涉入集體政治抗爭，但我們仍可從一些佐證加以推測。首先，Ahluwalia 指出厄國在一九七〇年代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擁有 73.5 % 的總收入。其不均的程度居拉丁美洲之冠。<sup>⑩</sup>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經濟危機，使得中下階層的勞工顯著的減少收入和生活水準。<sup>⑪</sup>因此，可以看出厄瓜多爾的兩極化的資本分配樣態。其次，本事件的肇因為工會領袖所領導的全國性罷工，也可以看出這是工人為主的政治行動。雖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介入本次的政治行動，以階級理論來說明也差強人意。

如果從差距理論來觀察並討論這一個事件，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首先，現代化的衝擊對所有開發中國家都是相同的。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快速的變遷，人口大量的移動，使傳統的社會逐漸解構。整體而言，厄國的現代也快速地進行，居住在都市的人口比例從 42.4 %（1975）到 57 %（1993）；識字率也逐漸提昇，分別為 74 %（1975）與 86 %（1993）。<sup>⑫</sup>

其次是經濟能力方面，包括了經濟水準的提昇與社會動員的機會。而厄國雖然在一九八〇年代逐步地改善其生活，但在一九九〇年代已無法提供經濟的成長也無能解決外債的問題。因此，廣泛的社會挫折便產生了（差距假設的第一個式子）。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及愈來愈多的外債，使社會民衆的動員機會和管道減少，於是政治參與便產生了（差距假設的第二個式子）。

就政治制度化的角度來看，厄國制度化的程度相當低落。從歷史和政治文化的心理層面而言，不管是人民或黨員政黨忠誠似乎不曾存在過。厄國無法發展出強有力的組織或意識形態。<sup>⑬</sup>不管是右派、中間、中間偏左、或左派的政客或派系經常相衝突，立法和行政一直是對立的，而選舉制度無形中又助長了多黨的持續。加上政治人物爲了權力，不惜更換政黨、自組政黨、或與其他政黨合縱連橫，爲了勝選也無意對政黨

註⑩ Montek S. Ahluwalia, "Inequa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3 (1976), pp. 307~342. 在 World Bank 的相關文獻如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各期中並無相關的資料。

註⑪ Catherine M. Conaghan, "Politicians Against Parties Discord and Disconnection in Ecuador's Party System," in S. Mainwaring and T. R. Scully, eds.,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52.

註⑫ World Bank, *Social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1995, p. 101.

註⑬ 選舉制度中規定各候選人均需屬於某個合法政黨。因此有野心的政客經常「表面地」依附某個政黨，一旦爲了利益，改換政黨像換穿 T-Shirt 一樣。見 Catherine Conaghan, *op. cit.*, pp. 448~449。而總統選舉的二輪投票制使得競選爆炸（1978~1992 的總統候選人數分別爲 6, 9, 10, 12）候選人逐年增多，且獲得少數支持的候選人得以進入二輪（最低爲 PRE 1988, 17.6%，最高爲 PUR, 1992, 32.5%）。大部分政黨候選人的得票率在 25 % 上下。在 1984 和 1996，第一輪得票率較低的 Cordero (PSC) 和 Bucaram (PRE) 在第二輪決選時卻獲勝。見 Catherine Conaghan, *op. cit.*, p. 440。





忠誠。在一個經常對立的情境下、人民的反對氣氛在利益交錯的情況下，便化作反對的行動了。Conaghan 指出厄瓜多爾的民主政治籠罩在「反對的氣氛」下，並發展出了一個多黨的政治系統。<sup>④</sup>它影響了精英的行為和策略，也導致了精英間立法和行政間經常性的衝突。選民經常改變其對政黨的支持，而政黨也改變其與民間團體的連結關係，並沒有長期跨社會階層的支持，政黨也沒有特定的經濟政策，政策和選舉也沒有特別的連結。但人民遇到了經濟的危機時，卻也用選票來懲罰執政黨。<sup>⑤</sup>由於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落，政治不安定便造成了（差距假設的第三個式子）。

## 伍、建構一個簡約的模型

由上述的核心理論和衍生的理論中，我們可以整理出一些有關政治暴力和革命行動的主張（說法）：核心是結構的失衡，制度的崩潰；是社會心理的產物；是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的產物。就衍生理論而言，是意識形態所主導的社會運動；是資源動員的結果；是相對剝奪的產物；是現代化差距發展的產物。

從不同的面向來看，一九九七年厄國政治暴力事件也可以從衍生理論來說明，每個理論都有相當的解釋力。而最有說明力的應是差距理論，因為它把整個暴力行動的結構性因素、心理因素、和理性因素均考慮在內。雖然從資源動員的角度固然也清楚地敘明行動的過程，卻沒有將長期的發展與結構性特徵描述出來。

雖然上述核心理論與衍生理論在描述與解釋上有不同程度的能力，但其間的因果連結關係並不清楚。因此要建構一個較為周延的模型，應包括結構、理性和心理三者，及其間的動態連結關係。為了更廣泛有效地說明集體行動，將三個主要層面間可能的動力關係整理如下：

- 一、結構 → 理性 → (行動)
- 二、結構 → 文化心理 → (行動)
- 三、結構 → 理性 → 文化心理 → (行動)
- 四、結構 → 文化心理 → 理性 → (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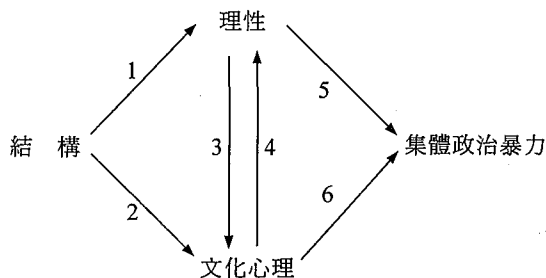
結構因素的形成是較為長期的，因而在所有可能的關係中，結構因素經由理性或心理文化因素而導致行動。在第一組關係中，理性的考量是基於對環境的評估與資源的動員。在第二組中，結構的變動造成心理上的挫折和不滿，進而產生攻擊性行為。在第三組中，假設在特定的結構中，理性因素先於心理因素。角逐團體的行動影響了一般人民的心理，進而導致行動。最後在第四組中，在特定的結構中，文化心理因素先於理性因素。人民的不滿心理，使角逐團體應運而生，因勢利導進行抗爭行動。

註④ 從 1979 至 1996 年，得過席位的政黨就有二十個，而得席位超過二十席的政黨有右派的 PSC (1992, 1994, 1996)，POPULIST CFP (1979)，中間偏左的 ID (1984, 1988)。

註⑤ Catherine Conaghan, *op. cit.*, pp. 434~435.



明顯地，第三、四組動力關係比第一、二組來得周全，是較為可能的模型。然而，在一般的行動中，理性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常互為因果，相互影響，因此較為完整的模型，筆者稱之為簡約模型，應為如下：



如果以這個簡約的模型來說明厄國的政治抗爭事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這個模型的解釋力。同時，在將來也可以將這個模型運用到其他個案，作為發展普遍性理論的基礎。首先，厄瓜多爾在結構發生變動（經濟衰退、政治腐敗、社會關係對立），使反對勢力有機會出來組織抗爭活動(1)。同時，結構的變動也影響心理的因素如不滿、不安和被剝奪感等，進而使人民走上街頭(2)。然而，在整個過程中，兩股勢力的消長除了決定在主客觀條件的變化外，軍方是主要的決定因素。而軍方為何先支持前總統 Bucaram 維持安定，隨後又不支持其所宣布的緊急時期呢？這樣的轉變反應出理性與心理的交互影響的過程。就制度面而言，軍方當然要協助總統在緊急時期維持秩序。由於軍方也是不滿的人民和挫折的團體，其直接的反應是要求和平解決政治僵局，以避免權力真空(3)。同時軍方也給前總統壓力，要求馬上對話。隨後在 Bucaram 屈服卸任，Arteaga 繼任後，軍方再給她「壓力」，終於使得議長 Alarcon 順利接任(4)。最後的行動，抗爭的行為是反對勢力所發動的，是反對勢力順著民心的向背所精心策畫的產物(5)。一般人民（被動員的和自發性的）加入示威的行列中，其所支撐的是對政局普遍的不滿(6)。

從理論的整理、個案的提出到模型的建構，本文嘗試從個案中搜尋一個較完整的解釋。如果集體政治暴力和革命行動要能妥切地被解釋，簡約的模型能提供一個較為周全的解釋；如果普遍性的抗爭性集體行動（暴力與革命）理論是可欲的，簡約模型應是最佳的候選理論。

\* \* \*

（收件：87年7月17日，修訂：87年8月17日，接受：87年8月21日）



## Books

	Overseas Price ( US \$ )			Domestic Price (NT\$)	
	Cost	Sea Postage	Air Postage	Cost	Postag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 Hard Cover )	24.00	8.00	39.00	600	50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 Hard Cover )	32.00	8.00	35.00	800	50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16.00	6.00	21.00	400	49
Chinese Communist Education : The Yen-an Period ( Hard Cover )	10.00	6.00	13.00	400	49
Legalism and Anti-Confucianism in Maoist Politics ( Hard Cover )	14.00	6.00	15.00	320	49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Communist China : Comparative Analyses ( Hard Cover )	16.00	6.00	19.00	400	49
Ting Ling	4.00	4.00	7.00	100	34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30.00	6.00	15.50	700	49
Peking'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32.00	6.00	19.00	800	49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on China	6.00	2.50	5.50	150	24
ROC-US Relation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 Practice and Prospects	16.00	4.00	11.00	400	34
La Chine Continentale	24.00	6.00	15.00	600	49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32.00	6.00	16.00	800	49
Post-Mao Sociopolitical Changes in Mainland China : The Literary perspective	12.00	4.00	11.00	300	34
Forces for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0	6.00	16.00	500	49
Symbolic War :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 – 1980	39.95	6.00	13.00	1,000	49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t a Time of Change	16.00	4.00	11.00	400	49
Northeast Asia and Taipei-Seoul Relations : Change and Continuity	4.00	3.00	6.00	100	24
The Asia-Pacific and Europ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40.00	6.00	12.00	1,000	49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4.00	6.00	19.00	600	49
Tendencies of Reg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30.00	6.00	12.00	800	49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ransition	8.00	4.00	7.00	200	34

*Place your order with*

Editorial & Publishing Sect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4, Wan Shou Road, Wen Shan,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8年5月

國內郵政劃撥帳號 0003436-2，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Constructing a General Model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Hung-Der Fu*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rebelliou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constructs a classification of three core and four derived theories. Among the three core theories, structural theory focuses on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 and conditio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volves organized groups as main 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theory points out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actor behavior. The four derived theories, based on the core theories, are relative deprivation, class struggle,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gap hypotheses. The gap hypothesis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best theory because of its specification of causal order. Using recent events in Ecuador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e following general model. Structural factors are preconditions which have an indirect effect on rebellious political action. Rational choice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reinforc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the two major variables that directly influence the onset of rebellious political behavior.

Keywords : political violence, revolution, core theories, derived theories, general model, Ecuador

